



● 作者/Stephen M. Walt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黃依歆

美國的大戰略： 回歸現實主義

The End of Hubris: And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Restraint

取材/2019年5-6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

(*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19)

現今世界局勢看似充滿了無窮無盡的挑戰：一個更強大又強勢的中共、網路空間的新威脅、增長的難民潮、復活的排外主義、持續不散的暴力極端主義、氣候變遷及各種更多樣的挑戰。隨著全球環境日益複雜，華府就更需要清楚思考自身的關鍵利益及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為何。最重要的是，一個成功的美國大戰略必須確認美國準備在哪個領域開戰，且是為何而戰。

雖然各界都認為在川普當上總統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將會澈底改變，但事實上美國該採取的最佳戰略路線圖應是再熟悉不過的。現實主義，意即在外交政策上採取務實(hard-nosed)的方式，這是美國在二十世紀中最常使用的手段，也是得以崛起成為強權的原因，如今它依然是美國的最佳選擇。



自由霸權戰略已使美國國力弱化，並讓美國受到不少傷害，唯有使美國回歸現實主義，採行離岸制衡戰略，才能重現美國偉大的國力，同時也能有效對付區域內潛在的挑戰者。

重現美國國力的途徑在於回歸現實主義。(Source: USAF/Justin Fuchs)



歐巴馬總統等人曾採取自由霸權戰略，試圖以美國價值改造全球政治。(Source: State Department/Jakub Szymczuk)

約二十五年前冷戰結束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菁英們拋棄了現實主義，改採另一個不切實際的大戰略：「自由霸權」(liberal hegemony)。這導致美國國力的弱化，並在國內外都讓美國受到不少的傷害。若要讓美國回歸正軌，就應該重返過去讓美國受惠良多的現實主義與自我克制。

若美國能重新擁抱現實主義，則將會著重於保護人民安全與維持社會繁榮，並捍衛美國崇尚自由的核心價值。政策制定者將會瞭解到軍事實力的重

要性，但同時考量到自己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因此會建議限制使用武力。此外美國將會推行「離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的戰略，同時不會為了要形塑自己所認知的世界而四處征戰，反而會在幾個關鍵區域維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只要狀況允許，華府會鼓勵外國政權扛起自身的國防責任，並承諾只防衛對美國具重要利益的地區，或是美國權力仍然有影響力的地區。如此一來外交就會回歸正常，美國人會在國內示範自身的民主

價值，並藉此作為對他國推廣美國價值觀的主要方式。

不破就不立

美國國力在十九世紀時處於弱勢，從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到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等美國領導人都避免與外國勢力交手，並專注於鞏固國內實力，接著再將國家勢力拓展至整個北美，最後將歐洲強權的影響力逐出西半球。二十世紀中葉前，威爾遜(Woodrow Wilson)與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這幾位美國

總統運用國家甫獲的強大國力，在西半球之外的幾個關鍵戰略區域恢復權力平衡。但當時他們讓其他的強權擔起大部分責任，因此當摧殘亞洲與歐洲的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不僅相對上沒有被戰爭傷害，還比以前更加強盛。

冷戰時期，由於其他國家無法擔起面對蘇聯的重擔，因此美國挺身而出並領導盟友對抗之。當時美國領導者大肆宣導民主、人權及其他理想主義的議題，但美國的政策在本質上依然是現實主義。透過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及其之後的經濟體系，美國也幫助促進更開放的全球經濟，並讓經濟成長能在金融穩定、國家自主及國內正當性之間取得平衡。簡言之，在美國大部分的歷史中，美國領導者都對權力平衡十分敏感，當在狀況允許時會讓他國承擔重責，除非有必要時才會出手承接困難的任務。

但在蘇聯解體後，美國發覺自己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狀況下，誠如前國安顧問斯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在1998年所言，「獨自站在權力的至高點……握有塑造世界的罕見機會。」美國領導人因此拋棄了在過去數十年運作良好的現實主義，並試圖以美國價值為標準來改造全球的政治生態。這個新戰略被稱為自由霸權，目標是將民主體制與開放市場推銷給全世界。這個目標連結了近代總統的政策共通點，從柯林頓(Bill Clinton)的「交往與擴大」政策、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自由議程」，以及歐巴馬(Barack Obama)在2010至2011年間對「阿拉伯之春」的支持，歐巴馬並公開聲明，「選擇自己國家領袖並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這樣的思

考方式獲得了國內兩黨、處理國際事務的聯邦官員，以及足以影響外交政策的多數智庫、遊說者及媒體人物等的廣泛支持。

在本質上，自由霸權是一個高度修正主義的戰略。與其在幾個具重要利益的地區維持利己的權力平衡，美國轉而尋求改造世界各處的政權，並將它們收編於自己主宰的經濟與安全機構下。然而成果卻令人十分失望：戰爭失利、金融危機、驚人的社會不平等、破裂的聯盟，以及膽大妄為的敵人。

霸權的傲慢

當柯林頓在1993年上任時，美國跟包含中共與俄羅斯等其他世界強權的關係良好。當時民主在世界各處擴散，伊拉克的武力正被卸除，而伊朗沒有製造核武的能力。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看似能化解以巴衝突，而華府也準備好領導完成這個過程。歐盟此時也在一面增加新成員，一面朝貨幣統一的方向前進，美國經濟也表現良好。對那個年代的美國人而言，恐怖主義是次要的議題，而美國軍力無人能敵。當年的美國國勢強盛，人民生活無虞。

然而這些美好狀況讓美國菁英們產生了危險的過度自信。如前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1998年的名言，他們確信美國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國家」，因此他們有權利、責任及智慧去形塑世界各地的政治生態。

但到頭來，這些想法都是狂妄的幻想。美國曾多次欲成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掮客，但最終都以失敗收場，歷任三屆美國總統的以巴



美國在伊拉克等國的駐軍不僅造成沉重的軍事負擔，還導致賓拉登攻擊美國本土。(Source: US Army/Jacob Ruiz)

策略不再是可靠的方案。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攻擊美國本土，導致華府發動包括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全球反恐戰爭。這些行動不僅是代價高昂的失敗戰役，也粉碎了美軍無堅不摧的光環。如今大部分的中東地區紛爭不斷，而從非洲至中亞都有暴力極端分子肆虐，甚至擴散到其他地區。於此同時，印度、巴基斯坦與北韓都在測試並部署核子武器，伊朗也將成為可能的擁核國家。美國2008年的房市崩盤凸顯國內

金融機構的腐敗，並觸發自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至今全球經濟仍然未從此災難中完全復原。

俄羅斯在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Crimea)後，又干涉其他多個國家的政治；現在是自冷戰以來，俄國跟西方關係最糟的時候。中共的權力與野心也在這段時間擴張，「中」俄合作關係開始深化。歐元區危機、英國脫歐決定，以及民粹主義運動興起等皆使歐盟的未來充滿不

確定性。世界各地的民主節節敗退，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調查，2018年是全球自由連續倒退的第13年。匈牙利與波蘭開始出現反自由的領導人，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年度民主指數已將美國從「完全民主」降評為「帶有瑕疵」的「部分民主」。

雖然這些反向發展不是單由美國造成，但美國在其中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些失敗根源都來自於華府採取自由霸權

戰略。首先，這項戰略擴大了美國所需負擔的安全義務，但卻又缺乏新的資源來支撐美國所承擔的義務。美國針對伊朗與伊拉克使用的「雙重圍堵」(dual containment)政策，迫使其將數千名美軍人員留在阿拉伯半島，對美國來說這是項額外的重擔，但卻導致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決定攻擊美國本土。北約持續向外擴張使華府不得不去保衛軍力薄弱的新成員，因為甚至連北約內的主要強國，諸如法國、德國及英國的兵力都在萎縮。同樣地，美國致力於推行民主體制、北約無限制的擴張，以及北約的任務已經遠遠超過原先的設定，也造成其與俄羅斯的關係惡化。另由於害怕美國的介入導致國家政權的更迭，也使多個國家開始追求核武嚇阻，北韓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當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亞成功推翻敵對國政權時，結果都沒有導致新的民主政體成長茁壯，反而帶來成本高昂的佔領行動、導致多個國家傾頹及成千上百位的平民死亡。若美國的領導者們認為這種戰略會有不同的結果，那都只是個錯覺：就算在最理想的狀況下，要創造一個可運作的民主體制都是困難的，更何況是要在一個陌生的分裂社會中建立民主，根本是癡人說夢。

最終，全球化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好處。為了貿易與投資而開放市場的結果，只是為中共、印度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中、下階層帶來大量利益，同時也讓世界上最富有的前1%富豪財產大增，但美國與歐洲的中、下階層收入依然沒有成長、某些領域的工作移至海外，而全球金融系統也變得更加脆弱。

由於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績，這也是為何當川普在2016年形容美國外交政策是「一場完全、澈底的災難」，並將矛頭指向與現實脫節又不可靠的菁英們時，許多美國人都同意他的說法。這些美國人並不是孤立主義者，他們只是單純希望自己政府能夠少花一點心思在管理世界上，反而多關注國內的問題。在川普之前的總統們似乎都瞭解這點，至少在競選期間是如此。柯林頓在1992年競選期間的口號是：「笨蛋，問題出在經濟！」小布希在2000年痛批柯林頓在「建設國家」上努力不足，呼籲外交政策應要「強硬但謙虛」。歐巴馬在競選時則承諾終止海外戰爭，並專注於「國內的國家建設」。這些回歸國內的政見很容易理解，因為已經有多份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自己國家過度投入於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並在幫助其他國家方面付出超過應盡的心力。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2013年有80%的美國人同意，「我們不應過度在乎國際局勢，反而是要更專注於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並在國內開始強化國力與創造繁榮」，此外有83%的受訪者希望總統要能更重視國內問題，而不是外交政策。柯林頓、小布希及歐巴馬都瞭解到這是美國人民想要的方向，但他們都無法做到。

川普也無法做到這點。雖然川普在推特與公開發言中時常質疑美國過去的政策，但如今美國依然在保護富有的北約盟友、依然在阿富汗作戰、依然在非洲追捕恐怖分子、依然為充滿問題的中東各附庸國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以及依然想要推翻數個外國政權。川普的風格雖然跟歷屆總統們



多數美國人已厭倦自己的國家老是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投入太多資源在提供他國安全。(Source: US Army/Matthew Crane)

大不相同，但在政策的本質上卻意外一致。這種狀況只會造成兩面皆輸的最差結果：華府依然在追求錯誤的大戰略，現在又再加上一個無能的粗人坐鎮白宮。

現實主義的實際示範

這種以美國霸權為目標的大戰略，至今已經有四位總統嘗試過，但四位得到的成果都不佳。筆者與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撰文呼籲過，是時候該讓美國回歸離岸制衡的傳統戰略了(編按：參閱《國防譯粹》第43卷第10期)。若要這麼做，首先要理解美國目前仍是現代歷史中最穩固的強權。它握有數千枚核子武器與強大傳統軍力，同時在西半球內沒有真正的敵

人。此外，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天然屏障也將美國隔離在許多威脅之外，讓美國領導者擁有大量的緩衝地帶來決定要在哪裡與何時開戰。

長久以來，美國政策制定者除了要確保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還要防止其他強權模仿美國來稱霸自己所在的區域。若是一個實力匹敵者在自己區域內沒有主要的對手，那它就會開始將實力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這就跟華府在近數十年內的作為相同。從美國觀點來看，讓歐亞大陸上的各個強權互相提防是樂見的情況，如此一來它們就更難介入美國附近區域。美國涉入兩次世界大戰來防止德意志帝國、納粹德國及日本帝國稱霸歐洲與亞洲。這個原則也造就了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但在當時美國無法將責任推給其他人，只能自

已承擔所有成本。

如今歐洲並沒有一個潛在的區域霸權，因此該區域各國都應該要逐漸開始為自己國防負起全責。歐盟所有國家總共超過5億人口，年度國內生產毛額(GDP)加總超過17兆美元。相對地，俄羅斯——歐盟國家的主要外部威脅——人口只有1.44億，年度國內生產毛額也僅1.6兆美元。此外，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每年在國防上的花費總和，是俄羅斯的三倍。因此，若認為歐盟(成員中包括了兩個有核武能力的國家)會無力去對抗一個經濟體比義大利還小的鄰國，這種想法是相當可笑的。

北約在美洲與歐洲都還有熱切的支持者，但這些國家的觀念已經過時了。雖然在圍堵蘇聯擴張、防範德國再度成為侵略性擴張主義國家上，該組織曾扮演關鍵角色，但如今蘇聯已經解體多年，德國也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並堅定致力於維持現狀。自從柏林圍牆倒下後，北約領導人們就不斷設法為組織規劃新的任務，但無論是在巴爾幹半島、阿富汗及利比亞等地，北約協助建立國家的成果依然未竟其功。除非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決定要支持美國帶頭去抗衡中共(關於這點，很難判斷它們該不該或想不想加入)，否則現在是時候讓美國逐步減少跟北約的往來關係，並讓歐洲人自己去負責歐洲的安全。要達成這點，首先要協調美軍從歐洲撤出，再讓一位歐洲軍官成為北約的最高盟軍指揮官，最後要清楚闡明美國不再是歐洲國家的第一道防線。華府在執行這些步驟時，不應抱著被趕出門的憤恨感，而是要秉持完成任務的成就感，並承諾會在美國與歐洲的共同利益上互相合作，例如氣候變遷、反恐行動

及世界經濟的管理。

華府在處理中東議題上也應該要回歸到傳統方式。為了要確保可取得維持世界經濟的能源供應，美國長久以來都在防止任何一個國家主宰石油蘊藏量豐富的波斯灣。美國在這方面一直仰賴英國，但英國在1960年代末期撤軍後，華府就開始依賴當地的附庸國家，諸如伊朗、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一直到伊拉克領袖海珊(Saddam Hussein)入侵並佔領科威特數月後，美軍才在1991年1月踏上中東土地。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為了因應海珊的行動，組織了多國聯軍以解放科威特，澈底消滅了伊拉克軍隊並恢復該區域的平衡。

如今華府在中東地區的主要目標，仍是防止任何中東國家阻礙原油進入全球市場。目前這個地區被多層次深度切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稱霸。此外，生產原油的國家仰賴能源輸出維持收入，導致它們急切想要向世界市場出售這些原油。美國重塑當地政治生態引起了不良後果，因此只要停止這種行為，想要維持區域的權力平衡應該相對容易。伊拉克與敘利亞的美軍應當要撤出，但為了保持未來可能會重返該區的可能性，美國依然可以維持在該區域的情蒐設施、預置設備及軍事基地。華府可以重施其在1945至1991年間的手段，靠跟美國有相同利益的當地政權，以維持該區域的權力平衡。

美國作為離岸制衡者，應該與中東地區所有國家建立正常化關係，而不是一面與某些國家維持「特殊關係」，一面又對其他國家懷有深層的敵意。該地區沒有一個國家正直或重要到值得華府



美國要維持有效的亞洲聯盟並不容易，因為近期日韓就發生了貿易紛爭。圖為首爾某間商店公告抵制日本商品。

(Source: AP/達志)

無條件的支持，也沒有一個國家可憎到應該被踩在美國腳底下。美國應該要像中共、印度、日本、俄羅斯及歐盟一樣，與該區所有國家維持正常化關係，甚至是包括伊朗。此外，這種政策也會鼓勵互相敵對的區域強權為了爭取美國支持而產生競爭，反而不是把這樣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華府目前應該闡明，如果當地夥伴國再持續傷害美國利益或做出違背美國核心價值的行動，那就會減少對這些國家的支援。未來不管從該區內外，如果任何國家欲威脅稱霸中東，美國都會幫助其

他國家抗衡它，並隨著威脅國所帶來的危險度調整作為與當地的駐軍。

華府一旦跟歐洲、中東的關係回歸正常與理性後，則完成離岸制衡戰略的美國就能將注意力放在唯一潛在實力匹敵者上，也是世界上唯一能成為區域霸權的國家：中共。如果中共國力持續成長，很有可能會迫使其鄰國跟美國疏遠，並接受中共成為亞太地區霸主的事實。若中共成為亞洲的區域霸權，就更能將實力投射至世界其他地區，並將影響力延伸到西半球。若要反制這種

可能性，美國應要維持並深化目前跟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及南韓的安全關係，同時持續跟印度、新加坡及越南培養戰略夥伴關係。只要美國不再資助富有的歐洲盟友，或不再浪費數兆美元在廣大的中東亂局上，它就有能力去承擔抗衡中共所需的軍事花費。

然而，要維持一個有效的亞洲聯盟並不簡單。華府在亞洲的盟友們各自被海域隔離，也不願意因為親美而危害到自己跟中共的商業關係。日本與南韓在歷史上的恩怨情仇也讓兩國很難密切合作，區域國家非常希望讓華府來完成建立亞洲聯盟的多數工作，而美國為達此一目標需要運用複雜的領導手段，並確保每個成員國都有平等的貢獻。川普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就是放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引發跟日本與南韓的貿易糾紛，以及沉迷於與北韓拙劣地交好，而這些對於問題都毫無幫助。

離岸制衡的風險

支持維持現狀的人必定會將這種行動曲解為重回孤立主義，但這是一派胡言。美國一旦成為離岸制衡者之後，將會深入投注於外交、經濟及軍事面向上（某些地區）。美國在軍事的花費上會降低，但它依然握有世界最強大的軍力，並會繼續跟其他國家來合作解決重大的全球問題，諸如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及網路威脅。差別在於，華府不再需要為那些足以保護自己的富有盟邦承擔重要的國防責任、不需要資助行為會危害美國利益的各附庸國，也不再試圖靠推翻政權、祕密行動或經濟壓力來傳播民主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華府會運用其主要力量來維持亞洲地區（仍需美國可觀駐軍的存在）的權力平衡，並投入更多時間、注意力及資源在重建美國國內的基礎力量。選擇離岸制衡戰略的美國會再次樹立榜樣，讓其他國家崇拜與模仿，因此會比目前美國更有效地推廣其所擁護的政治價值。

這種手段將會減少對於武力與強制的依賴，並把重心重新放在外交上。軍事武力依然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但使用武力將不會是最初的衝動，而是最後的手段。我們必須記住，華府歷史上幾個最成功的外交成就：馬歇爾計畫、布列敦森林體系、以埃和平協定，以及德國的和平統一等都屬於外交勝利，而不是在戰場上取得的。然而，近年來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府都偏向使用下通牒與施壓的手段，而迴避使用真正的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有太多美國官員都認定自己握有一手好牌，因此將對敵人小小的讓步視為跟投降一樣嚴重。所以他們才會對其他國家制定條款，並當目標國拒絕妥協時祭出制裁或使用武力。但事實上就連最弱小國家也不會願意對脅迫低頭，且強加只對單方有利的協定在他國身上，只會讓它們更有可能從中作弊，或是一逮到機會就反悔食言。外交手段要成功，需要讓雙方都能得到各自所想的一些好處。

此外，離岸制衡需要深度瞭解區域政治生態，這是只有資深外交官與該區域專家才能提供的知識。要在亞洲創造一個有效的聯盟來檢驗中共的野心，不僅是軍事任務，也同樣是外交任務。而這項任務的成功需要眾多熟識該區歷史、語言、文化與敏感議題的官員。



選擇採取離岸制衡戰略，會使美國將重心重新置於外交上。圖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Source: State Department/Ron Przysucha)

要回歸到離岸制衡戰略，代表美國外交部門也需要大幅重建與深化專業。外交大使的身分應該保留給有資格的外交官，而不是拿來酬庸重要人物或選戰時的贊助者，而國務院也必須發展、精進並更新外交準則(也就是美國如何用非強制性手段影響他國的方式)，就如同軍方會持續精進軍事準則來引導他們作戰一樣。外交人員的官階也應獲得大幅提升，當人員獲得晉升時，職業外交官應該要跟資深軍官一樣，享有個人專業深造的機會。

汰舊換新

雖然過去二十五年來不斷失敗，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菁英依然認為他們與生俱來就握有全球領導權，也認為華府必需持續強迫他國遵從美國的命令。這個觀點已是華盛頓特區內多數外交智庫的最高信條，也在特遣部隊報告、政策簡報及評論文章中頻繁出現。美國媒體也陷入了類似的集體迷思，其中專職的學者們幾乎都是頑固的新保守主義者或不知悔改的自由國際主義者，只有少數人擁護現實主義、自我克制，以及不干涉主義。

這個狀況造成的結果，就是在任何關於外交政策的辯論中，風向都會重度傾向繼續無止境的對外干涉。若要將大戰略導回現實主義的軌道，就需拓寬這些辯論的界線，並去挑戰擁護與支持這種失敗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利益。

外交政策機構的排外自封，也造成了內部成員推卸責任的嚴重狀況。雖然這個社群中包含了許多敬業、有想像力與值得尊敬的人員，但主宰這個社群的是一群封閉又互相深度勾結的內部人士，這些人不願意批判其他同僚，以避免對方反過來批評自己。這種狀況導致常犯錯的官員也能高升，並有更多新的機會來重複犯過去的錯誤。我們可以細數這些官員（與支持他們的評論者）需要為哪些失敗負責：他們貽誤中東和平進程、誤導北約擴張、搞砸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放任中情局在反恐戰爭中虐待拘留者、放任國安局無獲准監視美國人民、北約介入利比亞的災難性失敗，以及美國在烏克蘭進行的詭計讓俄羅斯有藉口佔領克里米亞。這些官員與評論者們在犯錯後，在專業領域上都沒有受到任何的懲罰。毫無意外地，這些人如今幾乎都還在政府、智庫、媒體或學術圈內享有高高在上的地位。

當然，沒有人是完美的，而且強迫大家要為所有行為負責也說不過去。政策制定者需要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並隨著時間變得更為專業。但當相同的人不斷地犯下相同的錯誤，並不願意承認也不感到抱歉時，就是去尋找擁有更佳想法新人才的時候了。

儘管外交政策機構內部停滯不前，但如今要實現更貼近現實主義、更自我克制的美國外交政

策，已經比數年前容易多了。雖然川普有種種缺點，但他對於菁英共識所表達的不滿，也讓自由霸權之外的替代戰略更容易被接受。跟年長者相比，美國年輕人傾向質疑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意圖。而許多新的國會成員也致力於拿回外交政策的控制權，這是過去七十年間的歷任總統們所牢牢把持的。

此外，強大的結構力量也開始置自由霸權於不利，離岸制衡戰略反而愈來愈被看好。中共崛起與部分俄羅斯勢力的復甦，都迫使美國更關注權力平衡政治，特別是針對亞洲。中東地區的棘手問題，會讓未來的總統不再願意在該區浪費人命與財力，更不可能繼續追求在該地推行民主的謬想。國防預算依然會相當吃緊，特別是當氣候變遷相關支出開始高漲，以及高達數兆美元的國內需求開始引發關注。

基於這些理由，外交政策菁英們最終會重新發現這個在過去幫助強化與維持美國國力、常據美國歷史的大戰略。雖然我們不完全知道正確的道路是哪一條，要達到終點也可能比預想中還久，但至少目標清楚在前方引領著我們。

作者簡介

Stephen M. Walt 係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國際事務羅伯特和勒妮·貝爾弗 (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教授，著有《善意的地獄：美國外交政策菁英和霸權地位的衰落》(*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乙書。

Copyright © 201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